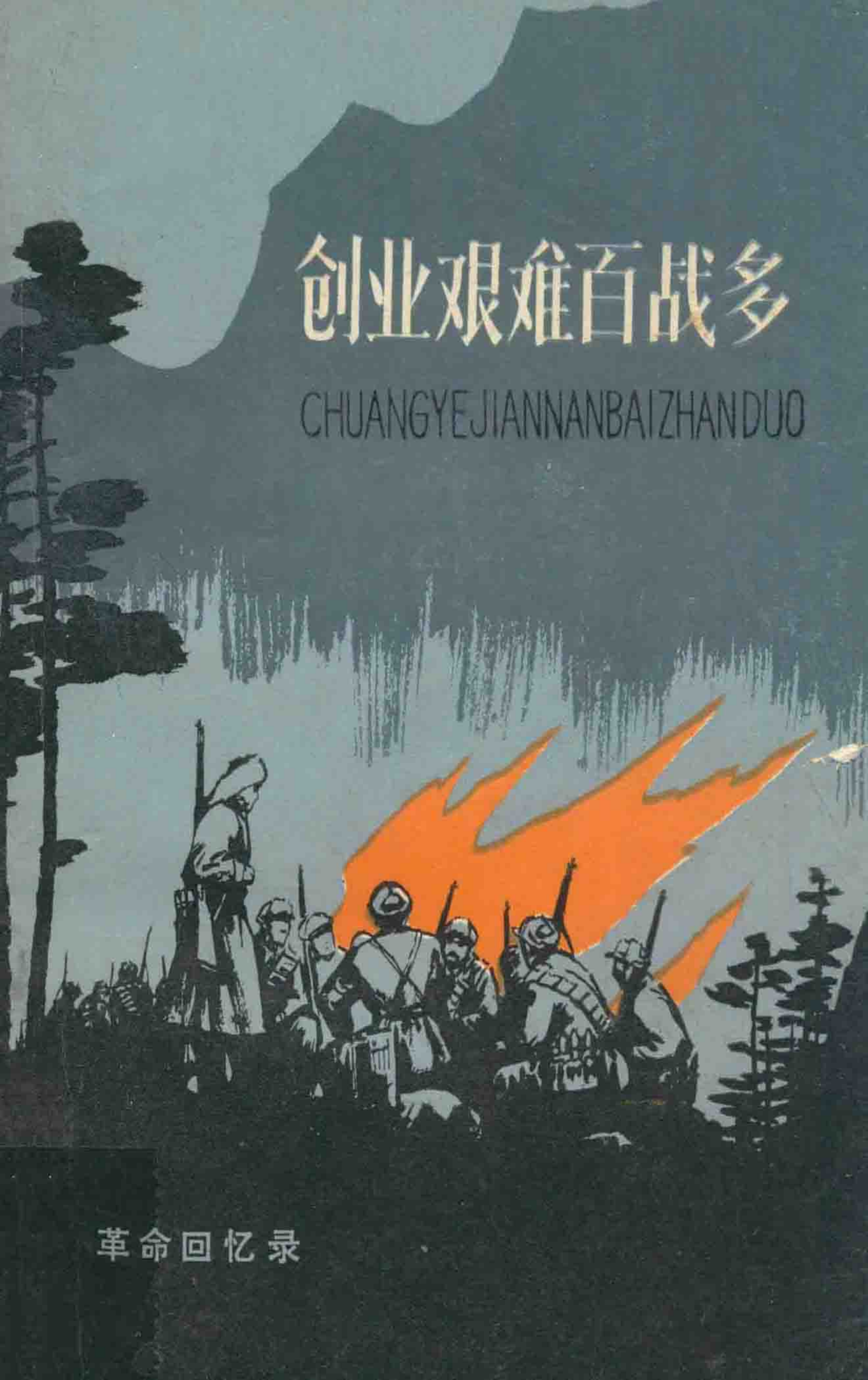


创业艰难百战多

CHUANGYEJIANNANBAIZHANDUO



革命回忆录

创业艰难百战多



目 录

创业艰难百战多·····	赛 希	(1)
塞北古城的星星之火 (外一篇) ·····	毕力格太	(12)
在广州农讲所的高布泽博同志·····	纳生、兰生	(37)
咱们也闹红党·····	李 森口述 咏 岭整理	(45)
铁窗内外·····	韩燕如口述 刘剑羽整理	(61)
思念·····	章叶频	(92)
短暂的相见·····	张 汶口述 安 超整理	(105)
巍巍大青山·····	郝秀山	(108)
我在土默特旗搞抗日工作·····	王 威口述 志 成整理	(135)
贾力更智炸日寇军火库·····	宣川山	(164)
勇夫同志引导我走上革命道路·····	杨达赖	(173)
战斗在土默川·····	王 瑜 山口述 王奎元等整理	(186)
韩家窑子歼灭战·····	黄 厚口述 火 华整理	(211)
通江口战斗·····	额尔敦仓	(218)

创业艰难百战多

——忆我的爸爸多松年

赛 希

编者按：

多松年同志，蒙古族，1905年出生于内蒙古呼和浩特郊区麻花板村。一九二三年在北京蒙藏学校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五年赴苏学习，次年回国，任中共察哈尔特别区工委书记。一九二七年，作为热、察、绥的代表参加了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同年，被叛徒出卖，就义于张家口大境门。

我的爸爸多松年，是内蒙古参加革命最早的蒙古族青年之一，他的一生虽然短暂，但是，他那为革命事业日夜操劳、英勇献身的精神却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他虽然在叛徒的告密和反动派的迫害下，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但是，他在内蒙古地区播下的革命星火，却早已化作了燎原烈焰，烧毁了那个吃人的世界。今天，我们幸福地沐浴在党的阳光雨露之中，而那些曾经为之英勇献身的先烈，将永远深深地铭刻在我们的心底。

现在我就根据一些老同志的回忆和爷爷、妈妈的讲述，整理出几件关于爸爸的事来奉献给读者。

地下宣传员

爸爸入党不久就担任了北京市西城区党的宣传员，从此，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才智都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出色地完成着党组织交给他的一个又一个革命任务。不会画画，他刻苦地练画，不善于讲话，他努力提高表达能力；写不好字，勤奋地练；不会刻印传单，细心地学……靠着一颗火热的心，他很快地学会了这一切，成了一名熟练的宣传工作者。他甚至毅然改变自己憨厚的性格，居然粉墨登场，扮演角色，大大方方地当起演员来了。

从菜市口到广安门，从西四到西直门，到处都有他的足迹。很多人在他的感召下，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参加到革命斗争的行列中。

那时候，全国的政治形势是很复杂的。一九二四年初，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民主义的三大革命政策。国共合作以后，工农革命斗争进一步蓬勃发展起来。十一月，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提出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中国共产党支持孙中山的建议，在全国发动召开国民会议的运动。很短时间内，各省市纷起响应，各地都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

北京的段祺瑞军阀政府迫于革命形势的压力，表面上不得不表示欢迎孙中山北上，另一方面，却提出用御用的“善后会议”来代替国民会议，以对抗全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同段祺瑞政府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北京的李大钊，上海的恽代英、向警予，天津的邓颖超等同志都参加领导了这次运

动。北京蒙藏学校的革命青年们是这次运动的生力军之一。吉雅泰等同志被党派回绥远地区，组织了“绥远国民党会议促成会。”爸爸和乌兰夫等同志在李大钊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在北京开展欢迎孙中山先生北上的工作。爸爸住到前门外大栅栏一个小旅馆里，从早忙到晚，有时连饭也顾不上吃。

一九二五年初，段祺瑞亲手操纵的“善后会议”召开了。为了反对这个会议，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所派领导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也随后在北京召开了。李大钊和孙中山亲自主持了这个大会，各省都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吉雅泰、奎壁、赵诚同志都以绥远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大会。

段祺瑞恼羞成怒，恨得咬牙切齿，动用大批走狗爪牙、巡警捕快去镇压革命人民。爸爸和他的伙伴们却毫不畏惧，坚持战斗在北京街头，同反动派进行了勇敢机智的面对面的斗争。

那些日子，不管是大街上，还是小巷里，几乎每天都出现一张张醒目的标语：“支持国民会议！”“反对善后会议！”“打倒军阀！”“打倒卖国贼！”“打倒帝国主义！”……愚蠢的军警们日夜巡查，却抓不到贴标语的人。

这天，在珠市口闹市上，爸爸打扮成一个商行的店员，在人群中散发传单。他挟着一卷标语，外面裹着几张商店的广告，不慌不忙地在行人中间穿行着。他刚刚机敏地散完一批传单，见四面没有人注意他，便停在一个橱窗旁，悄悄掏出一只小浆糊瓶，轻轻地抽出一张标语，迅速地抹好浆糊贴到墙上。随后，他若无其事地转过身抬腿就走。正在这时，

突然看见前面不远处有一个巡警，正趾高气扬地朝他这里走来。怎么办？从距离上判断，扭头逃走已经来不及了。他马上显出一副笑容，迎面朝巡警走去，刚走了几步，巡警问道：

“你往墙上贴什么？”

爸爸走到他面前，从腋下抽出一张广告递给他道：“招揽点生意，你老多包涵。”

巡警远远地扫视着贴标语的地方，但那里已经围了几个人在观看，恰恰挡住了他的视线，使他看不清到底贴的是什么，便收回目光，打量了一下爸爸，训斥道：“共产党正在搞赤化宣传，你们再不准随便贴广告！”

爸爸赶忙道：“好，我一定遵命。这点剩下的广告我们也不贴了，都交给你老先生吧！”说完，把那一卷标语塞到巡警手里，朝他点了点头，说了声“回见！”便从容不迫地走开了。

那位巡警恶狠狠地说道：“走吧！走吧！”

可是等他低下头来，仔细一翻手里的那卷东西，才发现广告里边夹的全是标语：“打倒军阀！”“反对善后会议！”便气急败坏地往地上一摔，转过身高喊：“抓共产党！”“抓共产党！”

爸爸早已钻进熙熙攘攘的人群，消逝得无影无踪了。

巡警转回身来一看，只见行人们正在抢读着他摔在地上的那些标语，又连忙瞪起眼睛大叫：“都给我放下！那是共产党的标语！”

身边有个小伙子故作惊奇地问他：“啊？这是共产党的标语？这不都是你刚才撒在地上的吗？”

巡警气得呲牙咧嘴说不出话来。过了半晌，跺着腿狠狠地骂道：“他妈的！你们都是共产党！都是共产党！”

当天晚上，爸爸回到蒙藏学校，正赶上邓中夏同志来检查工作。他听完爸爸的汇报之后，一方面表扬了他机智勇敢的精神，一方面提醒他进一步提高警惕，不可冒险粗心。然后问：“你们的传单文件放在什么地方？”

爸爸掀开自己的枕头和褥子说：“都在这儿。”

邓中夏同志指出这样很不安全，要他必须放在别人不易发现的地方。

第二天晚上，邓中夏同志又来了。一来就问：“传单和文件转移到哪儿去了？”

爸爸说：“这回可藏好了，就在这屋里。”

邓中夏同志上上下下地仔细观察着，忽然，他停下来，说：“是不是在天棚里呀？”

爸爸惊诧地问：“啊？你怎么知道的？”

邓中夏同志指着天棚上新补糊的一块纸问：“那张纸是你糊上去的吧？”

爸爸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

邓中夏同志接着亲切而严肃地说道：“松年同志，这两次都是李大钊同志亲自让我来的。李大钊同志正在开会，每天忙得很，可是他心里一直惦记着你们，他估计军警们这几天要加紧抓人，所以要我们格外当心，他知道你的热情高，有胆量，可是，越是在忘我工作的时候，越要注意你们的安全。他特别强调说，你们是内蒙古革命的火种，党把很大的期望寄托在你们的身上，可千万不不能大意啊！”接着他又问道，“你们这里有没有人们不大去的地方？”

有人插了一句：“后花园杂草长得乱蓬蓬的，听人说过去是军法处杀人的地方，阴森森的，人们很少去。”

邓中夏同志说：“好，咱们去看一看”。

随后，他们一起到后花园找到了一个多年不用的地窖，里边有一堆破花盆，他们决定把传单文件用花盆扣好，埋在窖里。

几天以后，果然有一批军警特务到蒙藏学校的学生宿舍里来搜查了。他们知道，在蒙藏学校里有一批革命学生是北京市革命风潮中的重要力量，可是，里外搜寻了一通，却一无所获，只好摇着头沮丧地离去了。

邓中夏同志的话长久地留在爸爸的脑海里。从那以后，他的行动更加谨慎了，他进一步懂得了革命事业的艰巨，革命道路的漫长，他时刻牢记着自己是蒙古族青年中的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宣传员，他决心把自己的工作搞得更好，让党放心，让李大钊同志放心……。

《蒙古农民》

为了进一步发动广大蒙古族人民起来革命，在广大蒙族群众中更广泛地宣传马列主义革命道理，党组织决定让爸爸负责创办一份小报——《蒙古农民》。

这是蒙古民族有史以来的第一份革命刊物。

爸爸接受任务之后，征得组织上的同意，决定先离开北京，回到蒙族聚居的察哈尔、绥远一带作一次短期的社会调查。

临行前，他搜集了《响导》、《中国青年》等各种不同类型的进步刊物，其中有铅印的、油印的，有公开的、内部

的……

火车呼哧呼哧喘着气，在群山间奔驰着。在隆隆震响的车厢里，爸爸开始思考如何来完成这个新任务。他想：《蒙古农民》的宗旨应当是：真实反映蒙古地区广大农牧民的苦难生活，报道蒙汉族人民的反抗斗争，同时努力传播马列主义革命道理和党的方针政策，揭露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地主王公们对各族人民的奴役欺凌，从而启发本地区群众的觉醒，鼓舞他们的革命斗志。火车在京绥路上穿过一个又一个的山洞，爸爸干脆闭上眼睛设想起来未来的《蒙古农民》的面貌来。当然，首先要有政治。内容方面要有通讯、报告、社会调查……，因为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文章要尽量写得通俗一些、生动一些。同时不能太长。版面既要严肃，又要活泼。根据民族工作的需要，还应当用蒙汉两种文字出版。就用油印吧，不必争取铅印，因为油印灵活方便。内容要紧，形式是次要的。稿子，可以找一些同志来写，不过，自己得多写一些。刻印，恐怕得自己动手。自己的字写得不漂亮，但是，清晰工整是可以做到的。发行，靠组织吧！

咦！这不是奇迹吗？一个从未办过任何刊物的青年人，竟能考虑得如此周全。是的，人间确实有许多奇迹。那些伟大的科学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艺术家或者古往今来的英雄人物，不是都曾做出过常人难以想象的业绩吗？爸爸也具有他们的优秀品质：忠诚、专一、勤奋、虚心……

不觉得多久，火车就到达了张家口。他下了火车，便去找中共张家口地委，然后由地委的同志带他到京绥铁路工会张家口分会、造币厂、电灯厂，以及一些中等学校进行了调查研究。当时，张家口刚刚举行过声援“五卅”惨案的大示

威，工人、学生的反帝热情高昂，不少学生奔赴农村开展宣传活动。于是，爸爸也越过万泉山来到了察哈尔农村牧区，找到当地的农民联庄会，开始了紧张的调查工作。他每天都要跑几十里路，从这个村到那个村，从王爷府到蒙古包，白天找农牧民聊天，晚上在小油灯下记笔记，生活中的材料真丰富啊！到处都有活生生的阶级斗争的动人事实，不几天功夫，就已经记满了一小本。

那时候，正是军阀混战的黑暗年代。张作霖、冯玉祥、阎锡山在北方大战，今天奉系打到山西，明天东北军打到河北，热察绥地区正处在拉锯战的中段，蒙汉人民倍遭蹂躏，几无立身之所，不论那一系军阀来到，都要强行征调军马、军粮、军草、军需。他们的部卒大都是些劫掠成性的兵痞，所过之处，抢夺一空，与土匪没有什么差别。群众一听到兵匪要来的消息，总是马上带着妇女外出逃难。当他们归来之后，家室尽成荒墟，凄惨之状，难以形容。尤其是蒙古族人民，惨遭反动军阀的大汉族主义民族压迫，牧场被开垦掠夺，牲畜被抢劫一空，多少人贫困破产，挣扎在死亡线上。

这天，爸爸来到一个蒙古族村落，见村里有几座东倒西歪、围着破黑毛毡的蒙古包，也有几处断壁颓垣的破败院子，牛羊圈里看不见有多少牲畜，到处是一片凄凉景象。他走到一所低矮的小土房旁边停下来，只见烟囱里冒着浓烟，院里静悄悄的，便走到门前去叫门。

好大一阵，才有一位衣衫褴褛的老人掀开草帘子走出来。老人上下打量了爸爸一阵子，才把他让进屋去。屋内四壁萧然。一家老小衣不蔽体，围着毡片或破羊皮，坐在炕头上取暖。

见到这副情景，爸爸感到一阵心酸，仿佛是回到自己的

家里，爸爸用蒙语向全家人问候请安后，便坐到炕上亲切地和他们攀谈起来。老奶奶一听爸爸是个蒙古人，而且不象是个坏人，于是向他哭诉起来。她说：家里仅有一点粮食都被抢走了，有几只羊也叫军队给杀的吃了，一家人好长时间没吃上饭了，每天靠地窖里的那点山药和萝卜度日子，即使是这些东西，也不敢多吃，只能一天吃一顿……听了大娘的诉说后，爸爸从自己的伙食费里取出一部分钱，交给老大娘：“这钱不多，你老收下买点粮食吧。”

两位老人千恩万谢，感激得不知说什么好。

坐在角落里的一个汉子突然跳下炕来，拉住爸爸的手说：“先生，你可别见怪呀！你刚一来，我不知道你是个蒙古人，听说你是来搞农民协会的，我还不信哪！不瞒你说，我是叫奉军抓去当兵，半路上跑回来的……

接着，他就和爸爸推心置腹地唠起来。他先是叙说了那年月老百姓没有活路的种种事实，然后又切齿咒骂起军阀和贪官污吏来。他特别憎恨大汉族主义，说：

“唉，依我看，汉人坏透了！专门糟踏咱蒙古地方，专欺负咱蒙古人……”

爸爸说：“是啊！大汉族主义的确可恨，它歧视少数民族。可是，那只是汉人里的少数有钱人、当官的搞的。汉人里大多数是好人，他们也是受苦人，他们受的苦不比咱们轻，他们也跟咱们一样，恨透了军阀和贪官。再说，蒙古人里也有少数坏人哪！那些王公们不是也跟军阀勾结起来，一块欺压咱们吗？蒙汉穷人是一家啊。”

接着，爸爸又给他讲了一些革命道理。讲得那人连连点头……。

回到宝昌城里，又跟县农民联庄会的人谈了几次。听他们讲，很多地方的农民都组织起来了，反王公、打土豪、抗捐税、抗清丈局，有的地方和城里的学生互相配合，互相支援，农民的革命热情非常高，城里有事一通知，他们就自己带上干粮从几十里地赶来参加斗争。有一个县的县太爷太坏，学生和农民联合起来，砸了他的公馆，抄了他的家，把“二堂夫人”的红罗缎被和绣花枕头都给扔出来了……。

得到这些丰富、生动的材料后，爸爸很快都记录了下来，写出了一篇篇富有说服力的调查报告和评论。

结束了察哈尔地区的调查后，便乘火车西行，随着汽笛的长鸣，来到了自己的家乡——呼和浩特。当时，这座塞外古城显得格外活跃，由吉雅泰同志为书记的中共绥远特别区工委，领导这里的学生和工人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声援“五卅”惨案的运动。学生们在市郊农村进行宣传活动，农村也在动荡之中。在大革命风暴即将来临的时候，多么需要有个从这里的实际出发的革命刊物引导这场斗争啊！爸爸不但从这里获得了大量生动的材料，而且也加深了对创办《蒙古农民》重要性的认识。

经过了一个多月的紧张战斗，《蒙古农民》第一期印出来了。当他把一份版面整洁、字迹清晰的刊物送到李大钊同志面前时，李大钊同志惊喜地说：“哎呀！松年同志，真想不到，你能搞得这么漂亮！完全象一个老手办的。辛苦了，辛苦了！”

赵世炎同志详细看完创刊号以后，对爸爸说：“不错，不错。有理论，有事实，内容充实，战斗性强。这几篇很有号召力，标题也起得好。这一篇简直是一发重炮！就这样办

下去吧。下一期可以再增加些内容，象介绍苏联十月革命啊，国内各地简讯啊，都可以。同时要突出一下对大汉族主义的揭露和批判。印数也要逐渐增加。”

接着，赵世炎同志又告诉爸爸可以找哪些同志写稿子，找谁帮他编排刻印。他说，党组织决定把这份小报定为党的内部发行刊物，通过它直接宣传党的主张，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把它作为党在内蒙古地区同各种反动势力、反动思想作斗争的阵地之一。

之后，《蒙古农民》随同《响导》、《新青年》、《工人之路》等革命刊物，一同散发了出去，特别是以张家口为中心，广泛散发到热河、察哈尔、绥远等地的蒙古族群众中。

《蒙古农民》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在蒙古族牧民中起到了很大的宣传鼓动作用。它诞生于艰苦而危险的环境中，爸爸为创办它而进行了辛勤劳动和英勇机智的斗争。但是，正当爸爸为共产主义事业日夜操劳、辛勤工作的时候，却被无耻的叛徒告了密。在敌人的屠刀面前，他坚贞不屈，勇敢斗争，终于英勇地就义了。《蒙古农民》虽然只出了几期，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却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大家都认为，蒙古族人民的第一份刊物《蒙古农民》和它的主编多松年，是永远值得人们纪念的。

爸爸的一生，是短暂的一生，然而，他的高尚品质、勇敢机智的战斗作风和为共产主义事业的献身精神，深深地留在了内蒙古各族人民的心中。他是一位深受内蒙古人民敬仰的革命烈士。他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怀念，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楷模。我们一定要以爸爸为榜样，为祖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塞北古城的星星之火

——记我的哥哥吉雅泰地下革命活动片断

毕力格太

〔编者按〕

吉雅泰同志是内蒙古土默特旗人，蒙古族。一九二三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四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回国后，长期作党的地下工作。全国解放后，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首任特命全权大使，内蒙古省委常委、统战部长，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中蒙友好协会副会长。曾被选为内蒙古第一、二、三届人大代表、中共八大代表。

吉雅泰同志是内蒙古地区参加革命最早的、建立内蒙古地区党的组织、开辟地下工作的领导人之一。解放前，曾在北京、天津、东北、内蒙古一带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和敌人进行了英勇机智的斗争。几十年来，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忠心耿耿地为共产主义事业、为增强民族团结做出了贡献。因此，深受内蒙古各族人民的爱戴。

在“十年动乱”期间，吉雅泰同志惨遭林彪、江青反革

命集团及其在内蒙古自治区的追随者的迫害，不幸于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二日含冤逝世。粉碎“四人帮”后，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为吉雅泰同志进行了彻底平反，推倒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在内蒙古自治区的追随者强加给他的一切莫须有的罪名，并隆重举行了追悼会。

验证一道生活的难题，究竟要花费多少血和泪的工本呢？

一个为革命奋斗了一生的老共产党员，被一群暴徒夺去了生命——不是在日寇的屠刀下，不是在蒋匪的枪口前，是在解放十二年后的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大院。

他是我的哥哥吉雅泰。

他死了，死得好惨！那是一九六八年的三月十二日。林彪、江青的帮凶们撕碎了他最后一缕生命的光。他赤着脚，被拖出“斗争会场”。他的肚上被割开一道长长的刀口，心，被挖了——那是一颗鲜红鲜红的心呀！

我没有落泪，我只是紧紧地咬着我的下唇：看他们横行到几时！

永别了，哥哥！他们杀害了你，杀害了太多太多的革命者，但是，未来就属于他们了吗？

乌云是吞不掉鹰的。暗夜过后，草原依旧碧绿碧绿。

我在电视机的荧光屏前，扬眉吐气地吸着香烟，喝着奶茶，看几个手上的血迹还没有来得及洗净（也洗不净）的匪徒被押上了审判台。我冷冷地笑了：“哼！你们也有今天！”

我又想起了我的哥哥。他的音容笑貌又在我的眼前活起来了。

我爱他，爱得很深，不仅仅因为他是我的哥哥。解放

前，他曾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下，出生入死，赴汤蹈火，进行了英勇、机智的斗争；解放后，他一如既往，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他应该是我的老师。

林彪、江青们夺去了他的生命，能夺去他为革命奋斗一生的光辉事迹吗？

千秋功罪，人民自有公论。

关于解放前哥哥为革命所进行的活动，我知道的十分寥寥，但是，能讲出来的，总觉得也是一份极好的革命教材，而且不必涂抹色彩，事实本身就是绚丽的。

写下来，以此表示对哥哥的怀念。倘若这些材料能对后来者有所启发、教育，那将是我最大的希望，假如死者真的地下有灵，或者也是一点微薄的慰藉。

一

那是在暴风骤雨席卷神州的大革命时期。

塞北古城归绥市*旧城巧尔气召内小南院的门外，突然挂出了“中国国民党绥远省党部”的牌子。看见的人们纷纷议论开了：“国民党怎么跑到喇嘛庙里挂牌子？”“图喇嘛的院子怎么成了党部？”“他们又要干什么？”“……”

就在外面的人纷纷议论的时候，这所小院的正房里，也进行着类似的谈话：

“孩子，你到底是在搞什么？”说话的正是年过半百的图孟道尔基喇嘛。他坐在炕边，紧锁着双眉，忧虑地望着坐在椅子上的那个眉目清秀、敦敦实实的青年。

* 归绥市：即现在的呼和浩特。